



西方文化 与中国近代小说

刘琦 赵利民 侯运华/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社会科学资助项目

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小说

刘 琦 赵利民 侯运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小说

著 者:刘 琦 赵利民 侯运华

责任编辑:胡学军

封面设计:李 晴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650mm 1/16

印 张:15 字数:225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416-7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近代悲剧意识及其在小说戏剧中的表现	(11)
第二章 近代作家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	(39)
第三章 中国近代小说观念变革与日本明治政治小说	(46)
第四章 域外小说翻译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变革的影响	(52)
第五章 从《〈红楼梦〉评论》看王国维悲剧观的实质	(63)
第六章 《新小说》杂志与晚清小说理论	(76)
第七章 《新小说》杂志与小说翻译	(90)

下 编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与晚清谴责小说	(107)
第二章 西方文化与晚清狭邪小说	(131)
第三章 西方文化与民初小说创作	(157)
第四章 西方文化与鸳鸯蝴蝶派小说	(186)
第五章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女权小说	(215)
后 记	(229)

绪 论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阶段。由此中国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经历了八十年的历史。这八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中国近代文学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中形成与发展，无论是文学理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价值观念等都深深地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正如郭延礼先生所说：“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创作主体、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体结构、语言形式、传播方式到接受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并在它的催生与中国文学自身创造性的转化中，中国文学才由古典走向现代。”“中国近代文学既是古代文学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是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的文学。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转型性，中西文化交汇和求新求变的特点，所以近代文学精神也具有新的色彩。（《中国文学的变革》第18、19页）

中国近代文学新的色彩，首先体现在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上。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念是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经世致用”之学，要求文学艺术必须恪守儒家的“道统”，即“文以载道”。而中国近代文学是伴随着民族的危机而诞生的，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任务。梁启超、康有为等近代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影响，把哲学上的变易进化观与文学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康有为主张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创作首先为社会，为政治，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文学要积极地、为政治和

现实服务。要改变中国古代文学封闭的状况，博采西方与日本文学之长，反映新的社会现实。

梁启超更是接受西方多方面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价值观念和文学的审美范围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文学创作不仅具有审美性，还具有社会功利性。即政治斗争、改造社会的作用。为实现这样的功能，他提出文学应向群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文学创作，具体提出了文学的语言的进化，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之故。”

因此他提出文学革新，倡导“诗界”革命，要求诗歌要具有“欧洲之意境”，欧洲之真精神，真理想。他倡导小说界革命。他认为文学是“传播文明之利器。而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为国民之魂”。杂诸多文学样式中，他认为小说最具有为社会改革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功能。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他对小说的性质与特点进行了探究，指出“人类之普遍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小说？——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所能受之境界，有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受之外，而间接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纯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字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梁启超从读者心理和小说的功能两方面分析了人类普遍具有的好奇心理，揭示了人们的趋同心理和

自我肯定的倾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读者对文学作品心理需求的基础。梁启超认为满足这两方面心理欲求,“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为此他得出结论:小说在满足读者心理需求方面具有“感人”、“移人”的功能。因此他主张用小说作为宣传政治改良的武器。在提出文学改良的同时,对小说创作理论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1897年起,他先后发表《变法通译论幼学》、《编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等文章。^①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园地。到此可见梁启超把小说的社会功能与它具有的艺术感染力结合起来,赋予小说高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价值与影响。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就是写政治小说,即“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他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促进变法维新,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这一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带来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繁荣。

其次在文学创作中,也明显体现出受西方文化影响后的新的变化。特别是小说创作。可以说近代小说是受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最深、最大的一种文学形式。在梁启超小说革新理论的引导下,各种小说刊物和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应接不暇。无论在题材范围,还是在叙事方法上都有新的开拓。在题材上,除政治小说外,还有历史小说、传奇小说、哲理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家庭小说、艳情小说、道德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无论哪一种题材,

^① 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615页。

都紧紧围绕近代社会变革，深刻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与追求，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如我国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直接宣传了政体改良，强调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如《黄绣球》、《女子权》、《女狱花》等宣传妇女解放的小说，针对两千年来中国女性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压制的社会现实，明确提出女性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真实地反映了近代社会妇女革命运动的情形。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源于近代维新思想家的提倡与发动，另一方面，则源于西方女权运动和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近代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女学，推行不缠足团体，传播西方女权运动的信息等等，都引导并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深入。

资产阶级改良时期，近代小说创作的主流是谴责小说。这类作品很多，反映社会问题也很广泛。像被鲁迅称为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描写了当时的政治维新和对西方文明的输入，抨击了晚清吏治和世风的堕落，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时期人民群众的普遍心态，反映出追求西方文明已经是时代的趋向。另一类所谓的狭邪小说，虽以名妓、名士、优伶鸨仆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是在名士与妓女的交往中，却真实地展现了人性的复苏，情与礼的对抗和对平等意识的追求。这些都表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最典型的是产生于辛亥革命前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影响。西方的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观念，引起了中国人对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崇尚情欲，尊重人性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近代市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小说在婚姻爱情描写中深刻揭露了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青年男女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予以严厉的批判。表现了青年男女对人格独立、自由婚姻的向往。这些都丰富了近代小说的内容，反映了时代的心声。

从传播西方先进政治思想到促进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近代翻译文学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改良主义者积极倡导对域外小说的翻译，严复、夏曾佑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拟出版“译诸大瀛之外”的小说王钟麟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翻译小说要于中国的改良

变法有所裨益，这也是判断是否要翻译的标准。他认为翻译文学是“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所以一定要选择那些与国事有关的作品来翻译。梁启超1898年所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从理论上提出要大量的翻译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小说。被看做是倡导翻译小说的宣言书。他说：“在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译介西方与日本小说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翻译西方文学是促进社会改良与革命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他自己亲自动手翻译了《佳人奇遇》、《经国美谈》、《雪中梅》等日本政治小说。而他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则在艺术形式上就直接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

作为近代翻译小说的实践者林纾，译介了一百多部作品，他翻译外国小说是以“有益于今日之社会”为出发点，在许多译著的序言中都在阐明他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是要激发爱国之思，寄托忧思之泪。他的翻译小说对鲁迅的早期创作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其审美理想、创作倾向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域外翻译小说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小说无论在创作观念、叙事方式、还是创作艺术技巧方面都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束缚，借鉴了西方及日本政治小说的经验和方法，表现出新的面貌。对促进近代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题材与审美情趣就是受到《茶花女》等作品的影响。近代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品类——科幻小说，也是在梁启超等人的译作《十五小豪杰》、周归笙翻译的《地心旅行》等作品的影响下而诞生的。

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方面，王国维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理论上，他以西方文艺理论展开对中国文学的评论，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评点式的批评方法，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体系。

首先是“境界”说，在借鉴传统意境的同时，王国维将康德、叔

本华的哲学理论融入其中，提出“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其中“观”，既是叔本华美学的“直观”、“静观”。王国维的所谓“能观”是指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时空的“领悟”。叔本华称之为“审美的领悟”。“能观”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本身能摆脱意志的束缚，忘掉个体的存在，“自由”地进入审美观照之中。即王国维提出的“合乎自然”。这一审美观念，显然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结果。

其二是悲剧意识的形成。王国维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惟意志论思想的影响，在人生观和学术研究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悲观意识。叶嘉莹曾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极其悲剧性的结局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二是他生来就有一种忧郁悲观的天性和富于悲悯之心的情怀。再一个原因是他对中国传统儒学至尊的学术状况的强烈不满。因而产生了极强的悲观主义和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超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以“中和”为美的古典审美理想，更多地表现出带有鲜明冲突性和崇高性的特征，这与西方悲剧意识有相似之处。

从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出发，近代文学理论家曾极力倡导悲剧的创作，蔡元培从启蒙美学的角度来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中习惯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悲剧观念，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就是悲剧观念。

在戏剧界革命的讨论中，蒋观云以西方戏剧作为参照，指出我国戏剧界的最大缺憾在于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因而热情呼唤“陶写英雄之力”的悲剧在中国早日出现，以传达民族蒙难时期悲壮的美感和崇高感。这种对英雄悲剧的呼唤与时代的牺牲精神取得了完美的和谐。王国维用生活、欲求、痛苦无限循环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和描写人生悲剧的作品，更赞美悲凉的美感。他们对悲剧的召唤和对悲剧意识的阐发，无疑开了现代悲剧意识的先河，也带来了近代戏剧创作的新变化和成就。

总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巨大的，也正因此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中国近代文学吸收了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了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的文学形态。在创作

题材、人物形象、思想意蕴、审美情趣、审美对象、审美理想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古代文学相比都呈现了新的面貌，并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近几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日益深入，除了对传统的、内部的、规律的探讨外，对来自外部的因素的认识、分析与研究也更受到专家的重视。但是，对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近代小说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开拓。正如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会长郭延礼先生所说：“探讨近代文学转型或文学的近代化是近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也是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为近代文学的爱好者与研究者，对近代文学的研究与开创当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前辈研究成果的指导下，在不断涌现的后起之秀的不懈努力下，近代文学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就。

上 編

第一章 近代悲剧意识及其 在小说戏剧中的表现

一、近代悲剧意识及其特征

悲剧意识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的一种体现，有了它，人类才能与各种阻碍力量相抗争并得以向前发展，近代悲剧意识更是如此，它是近代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面前之所以能以雄健、悲壮的精神抗争的动力之一。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所处的“内忧外患”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人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中。首先，封建专制统治的束缚到了末世，其力量虽很强大，但由于自明末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又加西学的输入，近代个体意识已经崛起，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也就更加强烈，更加自觉了。龚自珍的“悲愤”心态，魏源的“忧患”感，梁启超“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的苦闷而又压抑的体验，就是在此情形下产生的。其次，对国外列强的入侵所进行的反抗及其失败的结局，在近代人心灵深处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近代悲剧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十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悲剧时，涉及到这样一种悲剧类型：从世界范畴看，某些古老的民族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殖民地，他们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所进行的反抗，以及最后的覆灭是具有悲剧性的。马克思曾专门对封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瓦解给予论述。一方面，他指出了鸦片战争对于古老中国的正面的冲击作用，它对传播近代西方进步思潮，唤醒有识之士，促使中国人觉醒显然有着客观上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侵略战争本身是非正义的。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英国

殖民者为牟取暴利利用鸦片贸易、采取卑劣手段对中国的侵略，同时指出，古老中国对侵略者所进行的反抗具有悲剧色彩。他说：“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的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顺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不能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资产阶级为寻找其产品销路，建立殖民帝国，就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在殖民者的经济贸易侵略中，资产阶级就“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② 这是从被侵略国家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其悲剧性的。其次，从道德的角度看，古老帝国虽然已丧失其合理性，只能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扮演夜郎自大的角色。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中国皇帝反对鸦片输入中国，反对中国人吸食鸦片，显然符合人道，是出于保存国家实力的需求，因此，具有反侵略性、合理性、正义性。近代仁人志士为民族危亡所进行的斗争及所表现出的悲壮气概是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的。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尽管仍不失其强大的势力，但它所面临的困境已暴露无遗。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正统士大夫多从传统思维的角度来理解西方，他们从“内夏外夷”、“用夏变夷”的思路出发对西方的新技术、新思想采取抵制态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然而，在事实面前，毕竟出现了一批清醒的知识者，他们深切体察到了儒家文化的思维机制的根本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儒家文化的极不乐观的未来命运。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已逐渐丧失。随着儒家文化的衰落，他们从中心渐渐地被挤到边缘，个体生存的危机感也已露出端倪，近代知识分子不可能再回到这一中心。因此，无论从关心儒家文化的命运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生存的角度，他们都会产生极大的痛苦感。因此，进步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已不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脉脉含情，而是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总之，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那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已受到冲击，近代人已深切地感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独和悲哀，“乐观主义”在近代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已显得是那样的脆弱。王国维的悲剧观所带有的悲观、厌世色彩，即是个体所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念崩溃之后所产生的迷惘与困惑，乃至绝望的悲剧感，也许这种悲剧感太强烈了，以至于使他对人生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追问。

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士大夫与文人中不乏忧患意识，范仲淹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屈原、司马迁甚至曹雪芹都有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感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能导致真正的悲剧意识。到了近代，亡国灭种的灾难已经临头，内忧外患的现实让有识之士猛然醒悟，他们再也不能抱着“天朝帝国”、“华夏中心”的美梦盲目乐观了。因此，近代人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在近代，较早透露出忧患意识的是龚自珍。他身处封建末世，对时代的变化有深切体验，以其启蒙思想家的敏感感受到了社会深层的种种危机，在诗文中多处表现出他的“忧患感”，如《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诤次得十五首》一诗：“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岂夫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螫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另外，如“醺醺心肝淳，莽莽忧患伏”；“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忧患吾故